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域下和美乡村建设路径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始终将农民问题视为社会发展的根本,强调城乡融合与人的全面发展。在新时代背景下,基于对这一理论的继承与创新,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成为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战略目标。这一目标不仅是对传统“美丽乡村”建设的迭代升级,更是对城乡关系理论的时代丰富与发展。“美”侧重于外在的生态环境与基础设施,“和”则指向内在的社会和谐、文化认同与治理有序。当前,我国“三农”工作重心已全面转向乡村振兴。然而,在具体实践中,部分地区仍面临形式主义盛行、千村一面、农民主体性缺失等现实困境。如何运用科学理论破解这些深层次矛盾,探索出一条既符合现代化规律又保留乡土韵味的发展路径,成为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本文试图从理论逻辑、现实困境与实践路径三个维度,对这一问题进行系统阐释。

偏离“人民中心”的实践异化

当前和美乡村建设虽成效显著,但对照马克思主义人民主体论及“两个结合”要求,仍面临三重困境。首先是建设主体错位,农民“在场”却“缺位”。行政主导色彩浓厚,部分地方习惯“大包大揽”,规划施工多由上级或外包方操刀,导致农民沦为旁观者,项目与需求脱节,出现“政府热、农民冷”局面,严重削弱内生动力。其次是文化内涵流失,传统与现代陷入二元对立。盲目照搬城市模式,大拆大建致使乡村风貌“小区化”,割裂历史文脉与乡愁记忆;传统邻里互助与乡规民约被原子化生活取代,乡村丧失“和”的文化灵魂,仅剩钢筋水泥躯壳。最后是治理机制滞后,自治活力不足与形式化并存。部分基层党组织引领乏力,村民自治流于形式,“四议两公开”执行不严;加之青壮年外流引发治理“空心化”,留守群体参与受限,而数字化手段有时反增基层负担,衍生“指尖上的形式主义”,阻碍治理效能提升。这些深层次矛盾若不及时破解,不仅难以实现乡村由表及里的全面振兴,更可能偏离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方向,急需在实践中重构回归马克思主义本真,探索出一条既具现代文明气息又保留乡土韵味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回归马克思主义本真的实践重构

第一,坚持人民至上,激活农民主体内生动力。建设和美乡村,核心在人,关键在激发农民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要彻底扭转“政府干、农民看”

的局面,将决策权、建设权和监督权真正交还给农民。在规划阶段,应建立“村民议事会”等协商机制,让农民充分表达诉求,确保规划方案接地气、顺民意。在建设过程中,推广“以工代赈”模式,鼓励村民投工投劳参与家乡建设,让农民在汗水中增强主人翁意识。在管护环节,探索设立公益性岗位,引导村民制定村规民约,实行门前三包,形成“自己的家园自己建、自己管”的良性循环。只有当农民从“旁观者”转变为“参与者”乃至“主导者”,和美乡村建设才能获得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体现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主体地位的根本要求。

第二,深化“两个结合”,重塑乡村文化精神家园。和美乡村之“和”,源于文化的认同与传承。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度融合,挖掘乡土文化价值,避免乡村建设的“去土味化”。

一方面,要保护好古村落、古建筑、古树名木等物质载体,留住乡愁记忆。在村庄改造中,提倡“微改造、精提升”,慎用大拆大建,保持乡村原有的肌理和风貌,让乡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另一方面,要活化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将传统民俗、民间艺术融入现代生活,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通过举办“村晚”、评选“好婆婆好媳妇”等活动,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重建乡村社会的道德秩序和情感纽带。让传统文化在现代语境下焕发新生,使乡村成为既有现代文明气息又有深厚文化底蕴的精神家园。

第三,强化党建引领,构建共建共治共享治理

格局。办好农村的事情,实现有效治理,关键在党。必须把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作为重中之重,发挥其在和美乡村建设中的领导核心作用。要选优配强村党组织书记,实施“头雁工程”,回引一批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致富能手进入班子。健全党组织领导下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依托网格化管理,将党的组织触角延伸到村民小组、农户家中,及时化解矛盾纠纷,做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同时,积极运用数字化技术赋能基层治理,但要注重实效,减轻基层负担,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通过党建引领,整合各方资源,形成政府、市场、社会协同推进的强大合力,构建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为实现乡村长治久安提供坚实保障。

综上所述,和美乡村建设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生动实践。它深刻体现了“两个结合”的真理性力量,将城乡融合、人的全面发展等理论与新时代“三农”实际紧密相连。破解当前建设中的主体错位、文化流失与治理滞后等难题,关键在于回归马克思主义人民主体论本真。唯有坚持人民至上,激活内生动力;深化“两个结合”,赓续乡土文脉;强化党建引领,构建共治格局,方能真正走出一条兼具现代文明又富乡土韵味的振兴之路。这不仅是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更是中国式现代化在乡村场域的宏伟图景,必将为谱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乡村篇章注入不竭动力。

(张小翠,中共灯塔市委党校)

菏泽市文化产业发展与文旅融合路径研究

大力发展文化产业,推进文旅融合,是菏泽市把资源优势变为发展胜势、把文化软实力变成产业竞争力的主要手段之一。菏泽牡丹文化个性鲜明,黄河文化、水游文化、红色文化以及民俗非遗等资源丰富,有条件促使文化产业升级换代,实现文旅融合的良好基础。但是目前仍然存在资源整合不足、产品供给不足、品牌推广不力、消费环节过短等问题,在新时代的起点上,必须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使文化资源变成产业优势、消费场所、城市形象等。

突出特色引领,塑强城市文旅品牌

推动文旅融合,首先要把握最具辨识度的文化符号号召力。要围绕牡丹这一核心名片,统筹节会举办、景区运营、文创研发、演艺展示和媒体传播,推动“赏花热”向“四季游”延伸。进一步提升城市形象辨识度,品牌聚合度和对外整体传播影响力。同步梳理黄河、水游、红色、非遗等资源,优化主题线路和品牌矩阵,形成主次分明、各具特色、相互支撑的城市文旅品牌体系。

突出产品创新,提升融合业态供给

文旅融合不能停留在资源相加和门票经济上,关键是做优产品、做活业态。要推动文化资源与研学旅游、休闲康养、夜间经济、数字创意、电商直播、特色餐饮和精品民宿深度融合,推出一批沉浸式、互动式、体验式产品。特别是要做强牡丹食品、牡丹文创、牡丹美妆等延伸产业,把文化内容更好地转化为消费增量和产业增值,形成更多可持续的市场支撑点。培

育更多带动就业、拉动消费、彰显地方特色的可持续新增长极。

突出场景塑造,增强游客消费黏性

提升文旅融合质效,关键在于让游客愿意停留、乐于消费。要统筹老城街区、历史节点、文化场馆和商业空间更新提升,打造有烟火气、更具文化味的消费场景。围绕“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丰富实景演艺、非遗体验、主题市集和夜游项目,推动游客由“看景点”向“品文化、慢体验、深消费”转变,不断提高过夜率和综合收益,更好地把人气聚起来、商气带起来、文气传开来、消费持续活跃起来。

突出系统支撑,提升融合发展效能

大力发展文旅融合,还要从服务保障和制度建设上着手。要提升交通衔接、智能导游、停车住宿、市场监管等服务水平,加强项目建设、人才引进、宣传推广、利益共享等工作制度,促进政府、企业、民众团结一心,同时加强区域合作、线路整合、客源交换等一系列的活动,不断扩大文旅融合的综合影响力。

文旅融合不是简单的拼凑,而是资源重组、价值再生和动力转型。如果菏泽突出重点,把握亮点,在品牌塑造、产品供应、情境营造以及服务改进上不断进取,推动文化产业发展成为高质量发展的新增长点,将文化资源转化为发展动力、文化流量转化为经济产值,方能在不断融合中实现高质量发展。

(魏良冠,中共鄆城县委党校;李秀东,天津市宝坻区人民法院)

赓续伟大长征精神 筑牢新时代高校党建根基

长征精神蕴含的坚定信念、艰苦奋斗、团结奋进、实事求是、心系人民等核心特质,不仅是革命年代克敌制胜的精神密码,更是新时代推进党的建设、培育时代新人的强大思想武器。高校作为立德树人的重要阵地、青年思想引领的重要战场,党的建设的重要前沿,肩负着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根本使命。在新时代新形势下,将长征精神深度融入高校党建全过程,育人全方位,以红色精神铸魂固本、赋能增效,是提升高校党建工作质量、引领青年学子成长成才、服务教育强国建设的必然要求。

以长征精神赋能高校党建的内在契合性

伟大长征精神与新时代高校党建工作高度契合、内在相通,为高校党建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的精神推动。坚定理想信念、矢志不渝是长征精神的核心要义。长征路上,无数革命先辈怀揣救国救民的崇高理想,跨越千山万水、战胜千难万险,凭借坚定的信仰走出了一条光明的道路。这与高校党建强化思想建党、筑牢信仰之基的核心任务高度契合,能够有效破解部分青年师生理想信念淡化、奋斗精神不足、价值认知浮躁等问题。不怕吃苦、艰苦奋斗是长征精神的鲜明底色。在物资匮乏、强敌环伺的绝境中,红军将士不畏牺牲、迎难而上,凭借顽强拼搏的作风攻克重重难关,这正是新时代高校生修身治学、干事创业所需的精神品格。同时,长征途中全党全军严守纪律、团结一心、实事求是、灵活应变的优秀作风,与高校夯实基层组织建设、严明党员纪律作风、创新党建工作模式的发展要求高度匹配,能够为高校党建守正创新、提质增效提供根本遵循。

以长征精神赋能高校党建的实践路径

以长征精神赋能高校党建,要立足校园实际,聚焦育人根本,把长征精神转化为党建工作的具体实践,推动党建工作走深走实、见行见效。首先,以长征精神夯实思想育人根基,筑牢思想建设的重要阵地。高校要将长征精神融入思政课、主题党日、新生入学教育、师德师风建设等常态化工作,通过开展长征故事宣讲、红色研学实践、党史专题学习等活动,让师生党员在沉浸式学习中感悟革命精神、传承红色基因,坚定听党话、跟党走的理想信念,补足精神之钙。其次,以长征精神强化基层组织建设,激活党建内生动力。借鉴长征时期严密的组织体系、严明的组织纪律,规范高校教师、学生党支部标准化建设,严格落实“三会一课”、组织生活会、民主评议党员等制度,规范党员发展和教育管理工作,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师生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着力强化高校基层党建育人功能。

同时,以长征精神锤炼青年担当,推动党建与育人深度融合。立足高校育人特色,将艰苦奋斗、攻坚克难的长征精神融入学风建设、校园文化建设,引导广大青年摒弃浮躁懈怠,享乐安逸的不良风气。依托科学研究、志愿服务、社会实践等平台,组织师生党员深入基层、扎根实践,在磨砺中增长才干,担当使命。坚决破除党建与教学科研、学生管理之间的“脱节”问题,以党建引领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校园治理,让长征精神真正落地校园、浸润人心,实现党建工作与育人事业同频共振、双向赋能。

征程万里风正劲,重任千钧再出发。伟大长征精神,是永不褪色的红色旗帜、永不过时的精神财富。新时代高校党建工作,始终离不开红色精神的滋养与引领。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高校要持续深挖长征精神的时代价值,始终以红色铸魂,以党建固本、以育人赋能,将长征精神蕴含的信仰力量、奋斗力量、团结力量转化为办学治校、立德树人的生动实践,不断提升高校党建的科学化、规范化水平。引导广大师生党员传承红色基因血脉、赓续奋斗精神,勇担时代使命、矢志砥砺前行,努力培养更多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为新时代教育高质量发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壮阔征程注入源源不断的青春动能。

(陈希航 杨正军,贵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实践与经验研究”(24XDJ009)之阶段性成果】

乡村治理背景下农村思想政治工作研究

第四,组织动员:夯实乡村治理的队伍基础。乡村治理各项任务的落实,最终要靠人去执行。思想政治工作承担着教育党员、培训骨干、发动群众的重要职能。通过思想教育,可以提高农村党员的党性修养和履职能力,培养一批政治过硬、本领高强的乡村治理骨干;通过宣传发动,可以组织农民参与人居环境整治、平安建设、移风易俗等具体事务,形成人人参与、人人尽责的治理格局。

乡村治理背景下农村思想政治工作的价值意蕴

第一,工作主体弱化:谁来做的困境。在组织体系上农村思想政治工作虽有县级层面部署,但乡镇与村级责任主体趋于弱化。乡镇宣传委员身兼数职,难以专注投入;村党支部书记大量精力被产业发展、信访维稳等“硬任务”挤占,农村思想政治工作容易陷入重形式轻实效的倾向。同时,农村宣传员、理论宣讲员队伍老化、流失严重,年轻一代缺乏从业热情,导致工作队伍出现断层甚至断档。

第二,工作对象分化:对谁做的困境。当前农村人口结构发生深刻变化,不同群体的思想状况、接受习惯等差异较大。一方面,大量青壮年常年外出务工,村庄空心化、人口老龄化趋势明显,留守群体以老人、妇女、儿童为主,其关注重点是养老、医疗、教育等具体的民生问题,对抽象的思想政治教育缺乏兴趣。另一方面,返乡创业青年、外来经营主体等新兴群体不断涌现,他们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和较强的权利意识,对传统说教式的工作方式接受度相对有限。

第三,工作方法老化:怎么做的困境。不少农村地区的思想政治工作仍以开会、发文、广播、标语等传统方式为主,但当前信息传播技术快速迭代,农民获取信息的渠道逐渐向移动终端转移,村级广播和宣传栏的实际触达效果有所减弱。与此同时,一些基层干部对新媒体运用能力不足,不会利用微信

群、短视频平台开展思想引导,甚至因不当言论引发负面新闻。工作方法的代际落差,使思想政治工作难以进入农民的信息接收渠道。

第四,工作机制乏力:如何持续的困境。农村思想政治工作的长效机制尚不健全,在考核评价方面,工作成效难以量化衡量,实际操作中往往侧重于开会次数、台账完善程度等可见指标的统计,容易出现重形式轻实效的倾向。在资源投入方面,相关工作经费普遍缺乏专项保障,多从党建经费或办公经费中统筹安排,难以充分支撑常态化活动的持续开展。在协同联动方面,宣传、组织、妇联等多个部门均涉及农村思想工作职能,但由于条块分割,缺乏统一的平台和协调机制,导致资源分散、重复劳动的现象较为突出。

乡村治理背景下农村思想政治工作的实践路径

第一,主体重塑:构建多元协同的工作格局。解决“谁来干”的问题,关键在于构建党组织统一领导、各类组织协同配合、广大群众广泛参与的立体化工作格局。一是压实村级党组织的直接责任,将思想政治工作纳入村党支部书记抓基层党建述职评议考核的重要内容,明确其在价值引领、矛盾化解等方面的具体职责。二是建强专业化工作队伍,每个行政村至少配备一名专(兼)职宣传员,并给予适当的工作补贴。三是发挥群众自治组织的作用,依托红白理事会、乡村能人议事会等,将思想政治工作融入村民自治实践。四是动员社会力量参与,鼓励驻村干部、志愿者、大学生村官等成为思想工作的生力军。

第二,内容优化:实现宏大叙事的微观落地。破解内容虚化问题,必须推动思想工作从“高空作业”走向“田间地头”。一是做好话语转换,将党的创新理论、方针政策转化为农民听得懂的“乡音土话”,结合具

体事例和身边故事进行阐释,让农民感受到政策与自身的直接关联。二是突出问题导向,针对农民普遍关心的土地政策、惠农补贴、养老医疗等热点问题,组织政策解读和答疑解惑,在回应关切中实现思想引导。三是嵌入日常生活,将思想教育与移风易俗、人居环境整治、平安建设等具体工作相结合,让农民在做中学、在行中悟。四是挖掘乡土资源,把村规民约、红色故事、好人好事等作为鲜活教材,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亲切感和感染力。

第三,方法创新:推动传统优势与现代技术融合。工作方法创新要兼顾“老祖宗留下的”和“新时代创造的”。一方面,恢复和发扬思想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如谈心谈话制度。村干部和党员要定期入户走访,与农民拉家常、交朋友,在情感交流中掌握思想动态、化解矛盾纠纷。另一方面,积极拥抱新媒体,建好用好村级微信群、公众号、短视频账号,定期推送政策解读、农技知识、文明倡议等内容。鼓励村干部和年轻党员成为“乡村网红”,用农民喜闻乐见的方式传播正能量。同时,探索“线上+线下”结合的模式,线上收集民意、答疑解惑,线下解决问题、回访反馈,形成工作闭环。

第四,机制完善:建立常态长效的保障体系。从“运动式”转向“常态化”,必须靠制度来保证。一是建立需求研判机制,通过民情走访、问卷调查、大数据分析等方式,定期了解农民的思想动态和关注焦点,使工作内容始终“对准需求”。二是完善考核激励机制,将思想政治工作实效细化为可观测的指标,对工作突出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三是健全资源保障机制,将农村思想政治工作经费纳入县级财政预算,并鼓励社会资金参与。四是构建协同联动机制,由乡镇党委牵头,定期召集宣传、组织、妇联等部门会商,整合资源、信息共享、联合行动,形成齐抓共管的合力。

【鄆敏,宣城市千教基地办(中共泾县县委党校)】

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在民族地区的实践路径探究——以黔南州为例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

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以下简称“黔南州”)作为西南多民族聚居区,在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特色产业合作社、非遗文创、生态旅游等方面进行了积极实践,但仍面临内生动力不足、民族文化遗产与发展失衡、数字鸿沟和产业结构单一等突出挑战。本文聚焦现实难题与探索创新,重点梳理其“政府引导+市场主导+群众主体”协同、文化资源品牌化、数字乡村、生态产业等实践路径,以期为民族地区现代化提供参照。

当前中国式现代化在黔南州面临的特殊挑战

第一,内生发展动力不足,对外部依赖偏重。部分偏远村寨“等靠要”思想尚未根本转变,群众市场参与意识薄弱。农民合作社发展迅速,但运行质量参差不齐,部分合作社组织机构虚化、利益联结松散,存在“空壳化”“行政化”倾向,过度依赖政策,自主经营与市场适应能力不强,制约了成果巩固和可持续增收。

第二,民族文化遗产与现代化冲突。马尾绣、苗绣、水书等非遗技艺因未能有效对接现代消费,面临市场萎缩和传承人断层的双重困境。传统手工艺品形态老旧,难以融入当下生活,加之城镇化进程中年轻人对民族语言和习俗的情感淡化,文化断层风险渐显,“人走艺失、后继乏人”成为紧迫课题。

第三,数字技术应用滞后,人才支撑薄弱。农村数字基础设施仍有盲区,部分乡村网络不稳、数字化终端缺乏,电商下沉受阻。农民数字技能不足,合作社缺乏电商运营、数据管理经验,难以支撑农产品标准化与品牌化推广,特色产业向价值链高端升级遭遇瓶颈。

第四,产业结构单一,市场竞争力不强。农业仍以传统种植、养殖为主,产业链短,精深加工和分级包装环节滞后,都匀毛尖、罗甸火龙果等特色产品溢价有限。旅游业以观光为主,同质化明显,缺少深度文化体验和差异化业态,区域文旅品牌尚未形成,抗风险能力和综合效益偏低。

中国式现代化在民族地区的地方性创新与实践路径

第一,构建“政府引导+市场主导+群众主体”协同机制。通过“合作社+龙头企业+农户”模式,整合资源,推动标准化生产与品牌营销。以都匀毛尖为例,政府搭建产销平台,龙头企业负责精深加工与市场推广,农户以成员身份统一管护、共享收益,形成从茶园到市场的完整产业链。罗甸火龙果、荔波蜜柚等产业也采用类似联合合作,增强了小农户的组织化与市场适应能力,推动了品牌化转型。

第二,推动文化资源化、资源产品化、产品品牌化。搭建“黔南民族手工文创集市”,引入设计师对马尾绣、蜡染等纹样进行现代改良,开发服饰、家居等时尚文创产品,并通过展销和线上直播拓展市场。三都县将绣艺融入现代服饰,使非遗在当代生活找到新载体。这一路径让手工艺人获得稳定收入,强化传承信心,实现文化价值与经济增值的良性互动。

第三,实施数字乡村建设,提升农业智慧化水平。多点布局“数字合作社”与“云上

农场”,在茶叶、水果基地引入物联网设备,实现气候监测、灌溉远程调控和全程数据追溯。开展电商运营、短视频营销等培训,培育本土数字带头人,弥补人才短板。从种植到库存的数字化管理,提升了农产品品质与品牌信任度,为产业升级提供数字支撑。

第四,探索“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绿色发展路径。依托高森林覆盖率,发展林下铁皮石斛、灵芝种植及林蜂、林禽等复合经营,既守护生态环境又拓宽群众增收渠道。荔波、平塘等地利用自然景观与“中国天眼”等资源,打造森林康养、自然教育、天文科普等新业态,推动“观光旅游”向“旅居康养”延伸。这些实践将生态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筑牢生态屏障,走出“两山”转化路径。

黔南州的实践表明,民族地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坚持内生发展与外部赋能并重,促进文化遗产与现代转化共生,加快数字化转型与绿色产业培育。唯有走出特色禀赋、激发主体活力,方能走出一条富有民族特色、生态底色和时代亮色的现代化新路。

(汪永彬,贵州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